

## 国际关系

# 伊朗视野中的以色列

何志龙

[摘要] 伊朗根据其国家安全的需要和地区战略目标,在不同时期对以色列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巴列维王朝为了抵御苏联的威胁和应对激进阿拉伯国家的挑战,视以色列为外围战略盟友;霍梅尼虽然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化,对以色列公开指责,但因共同的安全利益需要,在两伊战争期间伊以秘密从事武器交易;海湾战争和冷战的结束,共同的敌人消失了,为争夺地区主导权,伊以展开激烈竞争甚至对抗;“9·11”事件后随着伊朗安全环境的恶化,为了争取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和转移伊核问题上与美欧的紧张气氛,伊朗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指责,甚至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袭击以色列。

[关键词] 伊朗;以色列;政策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6)06-0029-33

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它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存在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教派分歧,更使它在中东地缘政治中扮演着特殊角色。而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强国,自建立始即成为中东地区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伊朗与以色列虽然并不毗邻,但两国特殊的国情和复杂的中东地缘政治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伊朗在其地缘政治战略中如何看待以色列,不仅影响着伊以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本文以历史的视野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伊朗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原因,以求对理解当今中东局势及其发展有所启示。

### 一、巴列维王朝视以色列为战略盟友

由于巴列维王朝基于宗教感情及缓和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考虑,在1947年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伊朗作为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成员国,与印度和南斯拉夫共同提出了“少数派”方案。伊朗主张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包括一个阿拉伯实体和一个犹太实体的联邦国家,维护巴勒斯坦的统一。当该方案被否决,联大表决“多数派”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时,伊朗又与阿拉伯国家一同投票反对,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当以色列宣布建国并导

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尽管以色列政府已承诺给予伊朗最惠国贸易地位,甚至不惜对伊朗政府官员行贿,但巴列维王朝仍然拒绝承认以色列。<sup>[1]</sup>但是巴列维王朝对以色列的政策必须符合伊朗的国家安全利益。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巴列维认为,伊朗国家安全的威胁首先来自北方强邻苏联,其次是激进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与伊朗既存在着领土和边界之争,又有教派和民族矛盾的伊拉克。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巴列维王朝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伊朗成了美国中东战略的一根重要支柱。

为了应对激进阿拉伯国家的挑战,伊朗利用同样受到苏联威胁又与阿拉伯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以色列。在巴列维看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地图由内环和外围构成,内环就是阿拉伯国家,而外围则由包括伊朗、以色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组成。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勃兴,对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伊朗形成较大压力,巴列维希望通过构建“外围联盟”(peripheral pact)对阿拉伯国家进行牵制。1950年3月6日,伊朗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但由于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国内媒体、议会及宗教势力的反对,伊朗政府并没有给予以色列外交上的正式承认)。<sup>[2]</sup>1953年美国帮助巴列维恢复权力后,巴列维更加重视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退

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和阿拉伯激进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加强,巴列维进一步加强了与以色列的战略合作关系。巴列维邀请以色列情报人员“摩萨德”帮助建立秘密警察“萨瓦克”(SAVAK)和训练伊朗军队,同时巴列维更加重视以色列对伊朗安全的重要作用。巴列维曾对以色列驻德黑兰首席大使奥利·鲁波纳尼(Uri Lubrani)说,伊朗与以色列联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让犹太国成为伊拉克或其他阿拉伯国家进攻伊朗的一个牵制因素,“因为它将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如果阿拉伯国家进攻伊朗,以色列必将利用这一机会打击伊拉克的西部地区。”<sup>[3]</sup>在外围联盟战略思想指导下,伊朗与以色列在资助和武装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反政府武装方面进行了密切而卓有成效的合作,“摩萨德”把武器装备通过“萨瓦克”转交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牵制伊拉克政府。

巴列维王朝还积极发展与以色列的经济关系。早在1953年,伊朗就与以色列签订了石油供给协议。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从伊朗进口的石油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而且出口西欧。<sup>[4]</sup>随着70年代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和伊朗石油收入猛增,伊朗大量从以色列购置武器,每年进口达5亿美元之多。<sup>[5]</sup>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巴列维积极斡旋埃及与以色列达成脱离接触协议,巴列维向以色列承诺,一旦以色列交还埃及西奈油田后,伊朗将采取适当措施满足以色列对石油的需求。<sup>[6]</sup>也就是说,在力争缓和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同时,巴列维王朝虽然没有从外交上正式公开承认以色列,并在阿以冲突中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要求以色列撤回到1967年战争前的实际控制线,但视以色列为战略盟友和制衡激进阿拉伯国家的有效工具,并希望通过伊以友好关系来促进美国的犹太院外游说集团促进伊美关系的巩固和发展。<sup>[7]</sup>

## 二、霍梅尼时期伊朗对以色列政策的两面性

自20世纪60年代初,霍梅尼开始了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斗争。由于巴列维王朝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和美国在阿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霍梅尼把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斗争总是与反美反以交织在一起,把美、以、巴列维称之为三个“大撒旦”。霍梅尼指责巴列维在伊朗的专制统治是“为了犹太人、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sup>[8]</sup>把巴列维推行的“白色革命”,特别是其中涉及到宗教寺院土地的土地改革和世俗化改革,视之为反对伊斯兰,而与此同时,霍梅尼又把巴列维反对伊斯

兰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联系到一起,相提并论,认为巴列维王朝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理人,而以色列则是巴列维及其反动专制王朝的帮凶,是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代理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恐怖主义者一样犯下了极大罪行。<sup>[9]</sup>长期以来,霍梅尼视以色列如同一个“肿瘤”,如果不从该地区铲除,它将摧毁伊斯兰和穆斯林。<sup>[10]</sup>70年代,霍梅尼在标志其伊斯兰革命思想理论体系形成的《伊斯兰政府》一书中,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其理论核心之一,并在后来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奉行“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对外政策,视美国为“大撒旦”,而苏联是“另外一个大撒旦”,甚至苏联的威胁比美国更大,是伊朗的主要敌人;而且伊朗与西欧的关系也因美国人质事件而十分紧张;此外,霍梅尼主张输出伊斯兰革命导致与阿拉伯国家之间龃龉增加,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普遍采取防范甚至敌视立场。两伊战争的爆发和伊朗在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伊朗温和派再度重视发展与以色列“外围联盟”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感。因为伊朗军队的武器装备基本上都是巴列维时期由美国提供的美式装备,革命后伊朗与美国交恶,因而无法从美国得到武器及其部件,更加降低了因清洗而受到削弱的伊朗军队的战斗力。迫于无奈,伊朗曾在欧洲黑市上购买价高质劣的武器及零件,而在此时,以色列愿意向伊朗提供武器,霍梅尼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国家的存亡压倒一切。霍梅尼认为,伊朗与穆斯林的敌人打交道是为了伊斯兰事业的长远利益,并声称为了维护和扩大伊斯兰世界,可以不择手段。<sup>[11]</sup>1981年初,霍梅尼对此事做出裁决,宣布伊斯兰共和国购买以色列制造的武器合法,只要没有与以色列人直接进行交易。同时霍梅尼称,那种流传的关于伊以武器交易的说法完全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谎言”。<sup>[12]</sup>霍梅尼的裁决显然是掩耳盗铃或自我开脱,实际上这是两伊战争迫使伊朗不得不做出的一个外交妥协。但是注重意识形态宣传的霍梅尼不可能突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仍然强调反以色列的意识形态,以此保持国内民众的支持,并尽可能地争取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同情和支持,至少不要形成以伊拉克为核心的、公开的反对伊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朗领导层的这种矛盾心态,也就导致了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对以色列政策的两面性,即公开言论指责,秘密武器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以关系。虽然巴

列维王朝没有正式公开承认以色列,但巴列维视以色列为伊朗国家安全的战略盟友,双方进行了实质性的合作。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尽管与以色列存在秘密武器交易,这只是为了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而已,反对以色列不仅是伊斯兰共和国的立国之本,而且也有具体行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500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进入黎巴嫩同以色列作战,并以巴勒贝克为基地扶植黎巴嫩什叶派真主党。在黎巴嫩的伊朗革命卫队成员最多时曾达到2000人。伊朗武装、培训和资助真主党,使之迅速壮大成为一支令黎巴嫩各派甚至以色列也不敢小视的力量。<sup>[13]</sup>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真主党继续与以色列扶植的“南黎巴嫩军”作战,有时直接进攻以色列国防军,<sup>[14]</sup>其目标就是“在黎巴嫩消灭殖民主义,赶走以色列,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据报导,伊朗在黎巴嫩的花费1985年为3000万美元,1987年超过6400万美元。<sup>[15]</sup>表明随着两伊战争接近尾声,伊朗加大了支持真主党反对以色列的力度。

### 三、冷战后伊朗与以色列的竞争与对抗

90年代初,世界格局和中东局势以及伊朗和以色列国内政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苏联对伊朗国家安全的威胁消失。其次,海湾战争及其后对伊拉克的长期制裁,极大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伊拉克对伊朗的安全威胁也逐渐消失。最后,伊拉克入侵并吞并阿拉伯兄弟邻国科威特所导致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标志着对伊朗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影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衰退甚至终结。两伊战争后,伊朗百废待兴,需要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关系。1989年6月3日霍梅尼病逝,伊朗国内政治发生了变化,温和派和改革派力量有所上升,也为伊朗改善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创造了条件。伊拉克被削弱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相对上升,增强了伊朗谋求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信心。

在新的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中,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对抗。正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叶海亚·拉赫姆·萨法维(Yahya Rahim Safavi)在伊朗某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所说,伊以正处于一场全面的“非军事”战争之中。<sup>[16]</sup>伊朗在海湾战争中给予美国一定支持,也得到了老布什政府的积极评价,国务卿贝克暗示伊朗“作为海湾地区的一个主要力量”能够发

挥重要作用。<sup>[17]</sup>因为无论是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还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总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认为根据伊朗的面积、人口、教育水平和自然资源,伊朗注定是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应该在该地区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巴列维曾雄心勃勃,企图超越中东,梦想把伊朗建成印度洋盆地安全保障的主要力量;伊斯兰共和国初期,霍梅尼主张输出伊斯兰革命,希望伊朗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两伊战争削弱了伊朗的实力,德黑兰逐渐降低其角色目标,把伊朗的势力范围限定在海湾和里海,认为该地区的任何其他支配力量如果与伊朗长期追求的目标相抵触,就不可能实现该地区的稳定。然而,海湾战争后美国宣布保留萨达姆继续掌权以保持该地区的力量平衡,使伊朗认为这是美国有意让萨达姆政权来牵制伊朗。特别是美国主导的马德里中东和会将伊朗排除在外,更让伊朗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决心要遏制和孤立伊朗。因此在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之际,伊朗发起召集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在德黑兰开会,加大了反以宣传,指责支持美国倡导的中东和平进程是卖国的和平进程,并利用伊朗控制的阿拉伯人组织抵毁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政府。1993年9月14日,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指责巴解组织“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了卖国罪”,签署该协议是“卖国的第一步……它造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并呼吁“吉哈德”对以色列发动圣战。<sup>[18]</sup>伊朗反对阿以和谈的目的有三:一是对美以将伊朗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的报复,以此迫使美国承认伊朗在该地区的重要利益和作用。二是高举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大旗,树立伊朗的伊斯兰利益的真正维护者的形象。1999年4月,伊朗以“为以色列和美国充当间谍”为由逮捕了13名伊朗犹太人,其中10人被判处徒刑,以此显示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sup>[19]</sup>三是虽然海湾战争和冷战的结束,伊拉克和苏联对伊朗的威胁消失,但海湾战争后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对伊朗构成了较大威胁,为了迫使美国从海湾撤军,伊朗尽力制造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为了制造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扩大阿以冲突,阿以冲突的扩大自然会使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仇恨转向长期偏袒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阿拉伯人与美国矛盾的激化最终将迫使美国从海湾撤军。四是谨防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全面和解,形成阿以联合孤立伊朗的局面,即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谋划的“新中东”,这是伊朗最不愿看到的中东格局。伊朗反对阿以和谈就是要激起阿拉伯人与以色列

之间的全面对抗,在以色列的强大压力下,迫使阿拉伯国家积极主动地改善和发展与伊朗的关系,使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结成战略联盟,反对美国,孤立以色列,从而实现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sup>[20]</sup>

#### 四、“9·11”事件后伊朗视以色列为主要威胁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称伊朗为“邪恶轴心”,并列为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之首,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已经形成了对伊朗的包围态势。随着伊朗安全环境的恶化,伊朗国内保守派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伊朗保守派一贯指责美国在中东的霸权行径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以色列则是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此时则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指责。2002年4月5日,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进攻,并呼吁伊斯兰和阿拉伯产油国对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实行石油禁运。<sup>[21]</sup>2004年8月17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穆罕默德·巴吉尔警告以色列,不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否则伊朗将摧毁以色列的迪莫纳核基地。<sup>[22]</sup>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也表示,以色列的建立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伊斯兰世界已不能忍受其存在,必须将以色列从这个地区清除出去。<sup>[23]</sup>2005年10月25日,曾呼吁“消灭”以色列的伊朗新当选总统内贾德在一个名为“世界无犹太复国主义”会议上,更是语出惊人,声称“以色列必须从地图上抹去”。<sup>[24]</sup>“以色列的存在是对伊斯兰的一大威胁,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已经腐烂了,干枯了,很快将会被风暴摧毁”。以色列“正在走向毁灭”,整个中东地区“很快将会得以解放”。<sup>[25]</sup>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内贾德多次辩称有关以色列应该被彻底消灭的言论是正确合理的,反映了全体伊朗人民的心声。2005年10月28日,伊朗各地100多万民众集会,参加反对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日”,集会上也出现了“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的标语。一个名为“纪念全球伊斯兰运动烈士”的组织,组织400多名青年举行签名活动,宣称将在伊拉克和以色列发动针对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的自杀式炸弹袭击。<sup>[26]</sup>

“9·11”事件后伊朗视以色列为主要威胁,加大了指责力度,体现了伊朗三个方面的意图:首先,伊朗国内政治的需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对以色列是伊朗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国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团结国内保守派民众最有效的政治工具,内贾德的当选

及其当选后的一系列反以言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次,在美国对伊朗进行不断紧缩的战略包围的情况下,指责以色列就成为伊朗争取周边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与以色列仍未实现和平的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支持的重要外交手段,与这些国家建立地区反以抗美联盟,冲破美国的孤立和包围。最后,企图转移因伊朗核问题而导致的与美欧的日益紧张气氛,突出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是中东地区一切矛盾和冲突的根源。伊朗的这一企图也表现在伊朗对强烈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上,2006年“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中,伊朗坚定支持“真主党”的立场便是最好例证。

#### 五、影响伊朗对以色列政策走向的主要因素

半个多世纪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的历史表明,伊朗对以色列的政策取决于伊朗的国家安全利益。影响伊朗对以色列政策未来走向的因素主要有三:第一,伊朗国内政治的变化。伊朗国内政治有较强的意识形态特征,1997年哈塔米上台曾一度表现出务实外交,对以色列的政策也有所松动,但随着美国与伊朗关系的紧张,伊朗保守派势力增强,内贾德当选后对以色列的政策更趋强硬。也就是说,如果伊朗保守派继续处于主导地位,反对以色列仍将是伊朗的基本外交政策。第二,伊朗与美国关系的走向。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 and 伊朗彼此视为敌人,而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最主要战略盟友,美国与伊朗关系走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的走向。目前因伊朗核问题美伊关系紧张,伊朗对以色列的态度也更加强硬。第三,中东地缘政治的变化。一方面阿以和平进程对伊朗的以色列政策有影响,伊朗、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三者之间有互动关系,任何两方的过分接近都会被第三方认为对其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以色列往往成为被指责甚至反对的对象;另一方面,如果中东地缘政治变化中出现伊、以共同的敌人,可能促使伊以再次接近甚至建立类似巴列维时期的外围联盟。另外,如果美国继续干涉中东事务特别是海湾事务,支持以色列并在阿以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伊朗就会继续通过反对以色列来争取和团结阿拉伯国家。

[注释]

[1][2][12] Mansour Farhang, “The Iran-Israel Connection”,

-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11 Number 1, Winter 1989, pp. 85-98.
- [3] Sohrab Sobhani. *The Pragmatic Entente: Israel-Iranian Relations, 1948-1988*.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9, p.115.
- [4] Mark Tessler, "Israel, Arms Exports, and Iran: Some Aspects of Israeli Strategic Thinking",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11 Number 1, Winter 1989, pp.99-126.
- [5] Bishara A. Bahbah, "Israel's Private Arms Network", *MERIP Middle East Report*, January-February 1987, p.11.
- [6] [美] 吉米·卡特著:《保持信心——吉米·卡特回忆录》[M], 袁克安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年版, 第406页。
- [7] Gawdat Bahgat,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the Jewish State", *Israel Affairs*. Vol.11, No.3, July 2005, pp.517-534.
- [8] [9][11][15] 彭树智主编, 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 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第337页, 第341页, 第387页, 第380页。
- [10] [16] Nader Entessar, "Israel and Iran's 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XXVII, No. 4, Summer 2004, pp.1-19.
- [13] [14] 彭树智主编, 王新刚著:《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M],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第390页, 第365页。
- [17] Kenneth M. Pollack, *The Persian Puzzle: The Conflict Between Iran and America*, Random House, 2004, p. 258.
- [18] Clark Staten, "Israel's PLO Peace Agreement: Cause of Further Terrorism?", *Emergency Net News Service*, September 11, 1993.
- [19] 刘仲华、王超编:《一九九九年西亚非洲大事记》[M],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2000版, 第20页。
- [20] Trita Parsi, "Israel and the Origins of Iran's Arab Option: Dissection of a Strategy Misunderstood",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0, No.3, Summer 2006, pp.493-512.
- [21] 刘仲华、王超编:《二〇〇二年西亚非洲大事记》[M],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2003版, 第33页。
- [22] 王超、刘仲华编:《二〇〇四年西亚非洲大事记》[M],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2005版, 第22页。
- [23] 杨兴礼、冀开运、陈俊华:《伊朗与美国关系研究》[M], 时事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62页。
- [24] <http://news.sina.com.cn/w/2005-10-26/19557~275~9~0~4~s.shtml>
- [25] <http://news.sina.com.cn/w/2006-04-15/1018~87~03~51~5~s.shtml>
- [26] 王超、刘仲华编:《二〇〇五年西亚非洲大事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2006版, 第88页。

作者简介: 何志龙,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西安, 710069)

收稿日期: 2006-09-08

修改日期: 2006-09-27

---

amines the opposition still in terms of forms and motiv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opposition is traditional diplomatic friction rather than check and balance action aiming at the U. S.

## **20 Global Governance: Between Norms and Experience**

*by Lu Jing*

Global governance is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issues. Its emergence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importance. Global governance is both normative and empirical: the norm refers to the pursuit of ideal international order based on rights, which is composed of some common values; while experience refers to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 power struggle in pursuit of individual interests. The effective approach of global governance can be found in the unity and interaction of both norm and experie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24 A Preliminary Study of India's Economic Diplomacy towards ASEAN after the Cold War**

*by Ren Jia & Zhang Yi*

After the Cold War, India began to carry out its “East Word Policy”, promoting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ASEAN, and pursuing “the great power” strategy actively, thus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ia and ASEAN has witnessed a rapid development. Presently, the two sides have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dialogue mechanisms and decided to set up a free-trade area. As a result, their bilateral trade volume has been increasing rapidly. With the growth of economy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power, India tends to further strengthen its economic diplomacy, thus a better prospect of cooperation with ASEAN is to be expected.

### **29 Israel in the Eyes of Iran**

*by He Zhilong*

In terms of national security demand and regional strategic goal, Iran has adopted different positions toward Israel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Pahlavi, the Shah of Iran, in order to deal with Soviet threat and the challenge posed by radical Arab countries, regarded Israel as peripheral strategic ally. Khomeini ideologized anti-semitism and openly condemned Israel but Iran still carried out secret arms deals with Israel during the Iran-Iraq War, which served mutual security interests. After the Gulf War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re no longer existed a common enemy. The contention for dominant regional role led to severe competition, even confrontation, between Iran and Israel. After 9/11,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Iran's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win the support of neighboring Arab countries and divert attention from the tension with the U. S. and Europe over its nuclear issue, Iran escalated its condemnation of Israel and even supported attack on Israel by “Hamas” and “Hezbollah”.

##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34 The Fall of the Peg-top: the Failure in the U.N. Chinese Representation Policy of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in 1971**

*by Lu Xun*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topic of the decision-making context, progress and model of U. S. policy on the Chi-